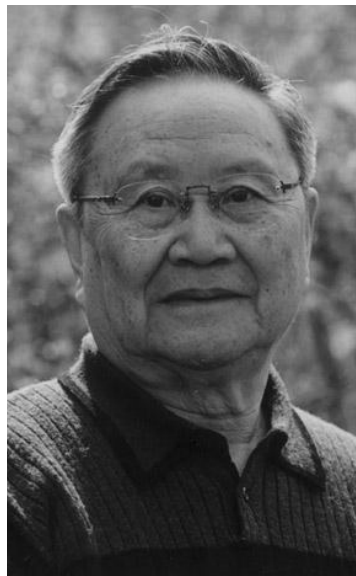


王元化先生与《古文字诂林》

■汪寿明



王元化(1920—2008年)

2018年5月的一天,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找到我,说出版社想重印《古文字诂林》(以下简称《诂林》)一书,以前同编委会签订的合同已到期,故希望能与编委会续签。《诂林》主编李圃(李玲璞,笔名李圃)教授不幸已于2012年11月逝世,而我忝列副主编,所以社长找了我。考虑良久,我勉为其难地应允了。6月初,我召开编委会讨论此事,与会编委都同意出版社重印。但由于各种原因,有些编委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于是我向华东师大中文系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请协助征求未参加会议编委的意见。不久,各位编委的意见通过中文系汇总了起来:一致同意重印《诂林》。7月3日我代表《诂林》编委会同上海教育出版社续签了《诂林》出版合同。经过出版社及印刷厂有关同志一年的艰苦努力,《诂林》重印终告完成。望着这皇皇十二册猩红色封皮的《诂林》,不禁想起了那难忘的时光,特别令我们想起了为《诂林》呕心沥血的王元化先生!

王元化先生是《诂林》的倡议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元化先生担任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他想用古籍小组有限的经费集中做几个古籍整理出版的大项目。原先计划增补和续编《说文解字诂林》(经籍纂诂),这个意见原则上得到了规划小组的同意,也得到了几位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支持。大家认为,这项工作极有意义。但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还是集中精力搞一部《说文解字诂林》。

1991年7月市古籍小组在锦江饭店举行会议,讨论《说文解字诂林》的编辑规划与设计,市委宣传部长、市出版局部分领导,市古籍小组一些成员,华东师大中文系负责人和几位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元化先生主持,华东师大中文系李圃教授谈了他对编辑工作的初步设想。与会者对书的名称、内容、体例、规模及编者的经费等

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8月22日,9月9日又两次在先生家召开小型座谈会,深入讨论编辑规划,内容体例,经费使用。并商定,由市古籍小组与华东师大一起筹备,于10月下旬召开一次论证会。10月26—28日,在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举行了第一次专家论证会,中国社科院的胡厚宣、张政烺,北大的裘锡圭、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华东师大的戴家祥等几位学术顾问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仍由元化先生主持。在会上大家对编辑工作的方方面面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次会后又增聘了北大的朱德熙和中国社科院的李学勤为学术顾问。也就是在这次会后,确定了书名正式定为《古文字诂林》。

上世纪20年代丁福保所编的《说文解字诂林》一书,荟萃了说文各家著述近200种,囊括了自汉唐至民国初年关于传世文字训诂之精华。但是,之后的新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大量出土的甲骨文、

金文等古文字及其研究成果却未有专著。现在,经过反复论证确定编纂体例的《诂林》,已不是《说文解字诂林》的新编或续编,虽然它仍按《说文解字》的首部顺序来排列字头,但是它将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石刻文等8种古文字有关的形音义的考释成果汇集在一起,“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完全是一部全新的、大型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

正是由于元化先生的积极奔走,大力呼吁,取得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正是由于元化先生以其非凡的胆略将古籍小组一年有限的20万元经费集中投入到《诂林》的编纂工作中,才使《诂林》得以作为上海市古籍出版规划重点项目立项,成了当时上海市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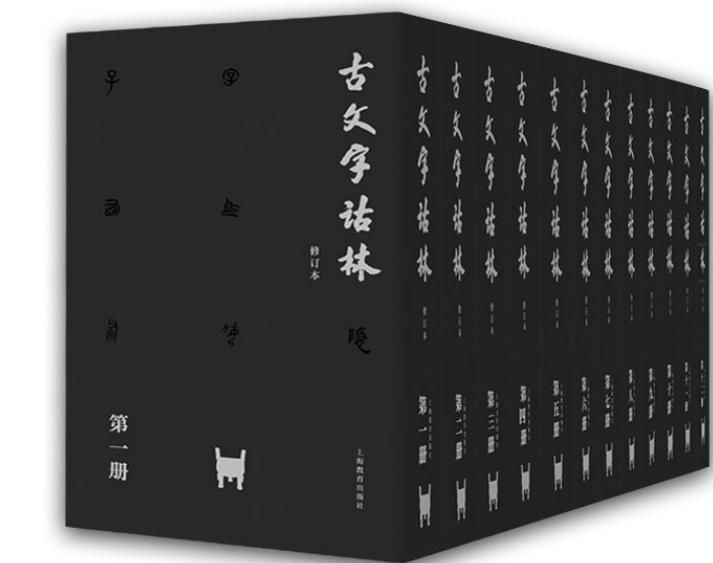
元化先生是《诂林》的组织者。要编纂这样一部千余万字的大型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必须要有一支队伍,而这支队伍又必须要有一位领导人。元化先生在倡议编纂《诂林》时,业已开始考虑队伍问题了。为落实编辑工作,拟请华东师大中文系李圃教授担任《诂林》主编。经与李圃联系,李教授表示愿意承担此项工作,但建议要与学校取得联系。于是元化先生亲自到华东师大,拜见了袁运开校长和郭德超副校长,一起研究决定,由李圃教授任主编,汪寿明任副主编,并在中文系专门设立《诂林》编纂室。编纂室成员除华东师大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外,还吸收了校内古籍研究所、史学研究所、情报学系、图书馆古籍部等几个系、所、部的一些教师;同时还延请外单位,如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复旦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当时上海市领导提出,“《古文字诂林》工程不仅要出成果,而且要出人才”,元化先生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不懈努力,组建起了这样一支富有力量、精通业务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同志们也确实没有辜负领导和元化先生的期望,他们在主编李圃教授的率领下,不辞辛劳,勤奋耕耘,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要出版这样一部大型工具书,还必须要高超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在这些方面,元化先生也是一位组织者。

以前出版有关古文字方面的书,因古文字形体点划不容有半点差池,而且还有不少异体字、生僻字,所以不是手抄影印,就是“剪刀+浆糊”剪贴影印。但元化先生和当时出版局的负责人都认为,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怎么还能允许仍采用陈旧的办法而不是利用电脑排版制作来印刷?元化先生就带领一些同志作调研,到印刷研究所、工厂实地去了解情况。经反复论证,1995年,由元化先生牵头,《诂林》编纂室与上海杰申电脑排版有限公司结成了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古文字字形库”“古文字排版系统”研究。这些成果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古老的传统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使《诂林》的出版开了以电脑技术排印古文字书籍之先河!

要编纂印刷出版如此大规模的一部工具书,单凭古籍小组每年20万元的资金,显然难以完成。对此,元化先生其实早已了然于胸,故未雨绸缪,向市有关领导汇报了情况,请领导出面,邀请几家出版社进行协商。当时很多出版社都资金匮乏,最后,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陈和决定勇挑重担,让副总编辑王为松与《诂林》主编李圃教授联系,表示愿投入50万元作编辑经费,并全部承担后期高额的出



《古文字诂林》(修订本)(全1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版成本费。这样,使《诂林》的编纂、印刷、出版都能顺利进行。

可见,元化先生不仅仅是《诂林》编纂队伍的组织者,还是为印刷出版《诂林》解决技术和经费的组织者!

元化先生是《诂林》的隐身者。我们翻阅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可以发现,里面多处记有与《诂林》有关的内容:“去华师大与古文字诂林编辑室人员座谈”(92年5月7日);“午后钱伯城、魏同贤、李玲璞、汪寿明来谈诂林事”(92年10月24日);“下午去华师大见诂林同人”(92年11月18日);“午后古文字诂林诸人来谈”(93年7月2日);“李玲璞借汪寿明来,他们告诉我古文字诂林将于二十日在华师大开会”(94年1月16日);“早去华师大主持古文字诂林汇报会”(94年1月20日);“早吴曼青来,嘱她将古文字诂林材料及照片等送金炳华等”(94年3月31日),等等。

其实还有不少为日记所未记的,如1993年10月,已年逾古稀的先生亲率钱伯城、魏同贤、李圃及几位编委赴京,在中国社科院举行论证会,与会的除在京的学术顾问张政烺、李学勤、顾廷龙(朱德熙、裘锡圭外出不在北京,胡厚宣因病卧床未参加)外,许多著名学者,任继愈、张岱年、汤一介、刘坚、许嘉

璐、傅璇琮、管燮初、傅允和等,都到会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另外,先生对《诂林》的“凡例”“前言”也字斟句酌,不厌其烦地进行推敲,据我所知,经他手修改了至少有三次。

由此可见,元化先生为《诂林》可谓殚精竭虑!然而,我们翻阅《诂林》初版,从头至尾看不到“王元化”三个字!元化先生一再表示自己只是“敲边鼓的”。大家曾考虑设一“工作委员会”,请元化先生任主任,先生反对;想署“总策划王元化”,先生又反对;准备在“前言”中提一下元化先生在成书过程中的作用,先生还是反对。最后,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总算答应为这部书题写书名,但不落款!于是,为《诂林》费尽心血的元化先生,最后却成了《诂林》的一名隐身者!这充分表现出元化先生的高风亮节。

《诂林》一书将千百年来历代学者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荟萃一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第一次;将甲骨文、金文等8大类古文字收于一册,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第一次。而《诂林》能顺利地编纂、出版,元化先生功不可没!

元化先生驾鹤西归已十年了,在《诂林》重印出版之际,仅以此文作为一柱心香,奉献给先生!

维护“文明的审判”不被风化

——《图说东京审判》序

■程兆奇

去年初,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受上海市社联委托,组织“纪念东京审判宣判七十周年”系列活动,其中的重头戏是在中华艺术宫举办东京审判绘画、影像展览。绘画是画家李斌创作的真正称得上“鸿篇巨制”的史诗壁画《东京审判》(168×4米),影像选自近年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从国内外档案馆等公私收藏机构搜集的相关录像和照片。接受任务后,交大社编辑崔霞多次表示,希望我们“顺便”编一本有关东京审判的图集。

选编图集之想,其实早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之初交大社即已提出。当时未出,主要是因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不久出版了《东京审判历史图片集》,而国图本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素材均来自当时交大社档案馆所藏的相关照片,如果简单编辑

出版,重复性太高。此次布展,影像只是以图说史中的“原料”,编辑成册,和国图本在架构上已完全不同;虽说主体都是“图片”(主要是相片),国图本可以说是“文献”,布展设计已是“著述”。因此,以布展内容为基础编成的这本“图说”,可以说已是意涵不同的全新品种。

在影像普及化之前,绝大多数历史事件都没有完整的影像记录,编辑图集,即使有珍贵的照片,也只能表现历史事件的吉光片羽。东京审判的不同,在于从开庭到宣判的整个过程都在镁光灯的聚焦之下,因而可以依照历史的脉络和进程选取图片,全景式地展现审判的方方面面。从这一点上说,就表现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丰富性而言,东京审判的题材可谓得天独厚。

因此,虽然国图长期以来没有出版相关图集,日本的各种出版品

则不在少数。如小泽武二所编《东京审判写真记录》,早在东京审判宣判之前即已出版。(小泽武二编:《东京审判写真记录》,东京,隆生社,昭和23年[1948年]7月20日发行。让人不解的是内容中居然有发行之后的判决内容。不知是不是判决后增加内容而未修改版权页?)以后相关图集的出版时有所见。拍摄有大量史料题材纪录片的日本著名导演小林正树,1983年根据美国所藏东京审判影片制作,曾产生很大影响的纪录片《东京审判》,小林正树一同时期访谈社出版的图集《写真秘录·东京审判》所附文章中说:之所以要拍摄《东京审判》,是因为“东京审判作为太平洋战争终结和战后出发的原点是我們不能不对面的巨大遗产”!讲话稿:《写真秘录·东京审判》,《私の東京裁判》,东京,讲谈社1983

年5月28日,第112页)。“巨大遗产”四个字,也可以说是一再再编辑图集,或者放大说东京审判长期受到关注的根本原因。

多年来我一直在留意东京审判的相关文献和著述,但未刻意搜罗图集,只是路过书店偶尔见到时随缘买回,现在手边所存仍不下二十余种。这些图集不仅选材、内容不同,诉求和目的也各异,这也是同一题材一再再编的原因。总体说,日本所编东京审判图集(影集,不包括板右翼小林善纪那样的绘图本,小林よしのり「いよいよA級戦犯一ゴ一宣SPECIAL」),没有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那样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众多的图集也不是没有倾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整个大环境的右转,不少图集都在前言、后记、勒口、腰封上不同程度地表明了东

京审判的“不公”。如以移送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前美国国防部所藏的东京审判录像胶卷为素材编成的《东京审判》,在勒口上写道:“不少人被不实之罪追究,得不到认罪、证言而无法反驳,便被处决了”;在前言中写道: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憎恶和复仇的仪式”。(三根生久大著:《东京审判——美国防务省未公开秘藏フィルムによる衝撃写真集》,东京,ダイナミックセラーズ出版,1998年)“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编辑的图文并收的《东京审判》,所载文章立场不同,如大沼保昭的《新的国际社会的法实现行动——从国际法看东京审判》,完全是从学理的角度的论述,但该书腰封的广告词却是:“败者遭到胜者断罪的复仇剧!”“产生不合理判决和多数冤罪的战争犯罪审判的一览”。(太平洋

战争研究会编:《东京裁判》,东京,新人物往来社,2003年)

简叙日本相关图集的编辑企图,是因为书成之际,责编邀作序,而且明确要谈一下我们编纂这本图集的意义。本来我想,一本普及性的图集,不一定要谈“意义”,而且虽然本书的编辑方针和框架由我拟定,但主要工作由石鼎、赵玉惠、龚志伟承担,由我来谈“意义”也不甚合宜。但屡辞不获,只能通过日本相关图集的主张来反衬本书“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编辑的图文并收的《东京审判》,所载文章立场不同,如大沼保昭的《新的国际社会的法实现行动——从国际法看东京审判》,完全是从学理的角度的论述,但该书腰封的广告词却是:“败者遭到胜者断罪的复仇剧!”“产生不合理判决和多数冤罪的战争犯罪审判的一览”。(太平洋

《图说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重新认识荀子和儒家传统

■陈建华

与魏承思兄睽违已久,不是他在洛杉矶,就是我在上海,碰不到一起。前月在香港见到,他精神极佳,像以往一样,海阔天空,大谈学问,告诉我近数年他专注于古经典,关于《中庸》与《管子》的著作已经出版,《荀子解读》也将付梓。我知道数年前承思曾患眼疾,又大病一场,却挡不住他向学传经之心,且斗志弥坚,成果累累,不禁为老友高兴,也敬佩不已。

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我送来他的《中庸解读》与《管子解读》。拿在手中沉甸甸的,令我顿生向学之心。其实孔孟老庄我也读过一些。《中庸》为儒家“四书”之一,诸子中《管子》以艰深著称,虽然心知其重要,却未曾涉略。这次怀着补课心理开始读起来,愈读愈觉有味。《管子解读》共10讲,150篇。从政治哲学、养生与处世之道、经济、管理与法治方面的论述,到阴阳五行思想等,每篇一两千字,精义纷呈,抽丝剥茧一般把博大精深的《管子》讲得透彻,且语言精悍,结合一己生活体验譬喻,因此读来轻松愉快,心智洞开,收获满满。

《管子》是奇书,《管子解读》也是奇书。乍看可说是一种近年流行的“国学”普及读物,但魏承思不离书生本色,举重若轻,以严格的学术规范一以贯之。其实这是一种新的富于创意的解经方式,对《管子》一段段原文讲解,原本而实在,词义辨析简明扼要。书中对于《管子》的作者、版本源流及所以难读的因由皆一一交代,都属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乾嘉工夫,若不是沉潜积学多年,决难臻此境界。

《管子解读》封面上印有“领袖需要的智慧”的字样,固然是宣传卖点,却也凸显了管子思想和魏承思向来重视实践的特点。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孔子肯定管子在治国方面的杰出才能,甚至把他看作文明的捍卫者。《管子解读》中150个小标题很有意思,如“德治不是空洞的教化”“施政要靠制度”“不扰民,不折腾”等,管子处处贯彻“以人为本”,常用历史教训作比方,强调“道、德和理”“义、礼和法”的重要性,这些当然对于今天各行各业“领袖”精英当然

有益与警示作用。

同样的解读方式贯穿于《中庸解读》中。首附原文,共27章,与朱熹的33章略有不同,重新分章断句分50节,逐字逐句作“释字与通义”法解读。承思表示要学习儒家经典,《论语》是“基础课”,《孟子》是“提高班”,《中庸》代表“儒家文化的精微处”,不啻是“研修班”。《中庸》有3544个字,要一字不绕地读出其微妙处,颇难。但真能这样去读,则乐在其中且其乐无穷,一辈子受用。所以作者字斟酌,力求平实,宛现“中庸”的精神。书末有三个“附录”。一是从《礼记正义》中辑出古本《中庸》,二是朱熹的《中庸章句集注》,可供学者比较参究,三是《中华现代礼仪》。

封面上“我们时代的中庸”一行字表达了古为今用之意,第三个附录《中华现代礼仪》正体现了这一点。魏承思根据《中庸》的精神提炼出能够为我们今天借用的十条礼仪规范,从仪容、仪态、应对到婚丧仪式等,我觉得非常切合日常日用,若能实行,礼仪之邦将容光焕发,善莫大矣。

魏承思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师从杨廷福先生,打下国学功底,陆续发表了《佛教的现代启示》《佛教与人生》等著作,后来因机缘会成为南怀瑾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太湖大学堂任教,讲授国学经典,著述不断,有《中国佛教文化论稿》《国学讲读》等,更传承了南师的文化通观、兼容并包的世界襟怀,而新问世的《荀子解读》更显示出他的“国学”精湛不已,别有一番重估传统的气概。

《荀子解读》三十万字原是在同济大学大学的授课讲稿,共10讲84节。讲法上不像前两种对文本逐句讲解,而以问题着手,大气开阔,不乏某种论争风格。我们知道,历来对于《荀子》聚讼纷纭,荀子虽属儒家,但被儒家正统所排斥。在诸子中,与《管子》同样难读,内容更为广泛,涉及哲学、伦理、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教育、文学、逻辑各个领域。魏承思探究《荀子》的动力之一就是要做到“通观”,这也是南怀瑾的教导。他指出,迄今对于《荀子》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个方面,或片言只语,“很少有人能把整部书打通了,来解读荀子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一讲讨论荀子的“性恶论”,充分表明《荀子解读》的问题意识及其挑战性。魏承思指出,战国时期祸乱相寻、弱肉强食,孟子的“性善论”虽然动听,但无济于事。荀子揭示“性恶论”,正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透彻理解。他强调“礼”与“法”的辩证关系,主张在礼义的原则下辅之以法治,才是振作人性、重振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建构礼乐制度,真正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为儒家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魏承思表示:“我所以选择讲《荀子》,就是要颠覆今天的儒家观,让你们了解统治过去二千多年思想的儒家本来面目是什么。”通过广征博引、条分缕析的讲解,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荀子:其礼法并举的思想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的先河,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本,也吸收了道、法、名、墨、兵诸家之长。根据魏承思的精辟总结,荀子思想具有博学深思、批判精神、兼容并包与重视实践的特征。他说:“最后一点,与思孟、程朱一派儒学大师相比,荀子思想更接地气。他的全部学说都是围



《荀子解读:人生修养的儒家宝典》,魏承思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98.00元

绕着当时政治展开的,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效。”这些阐述不仅大大刷新了我们对荀子、对儒家传统的既有认知,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也必定带来新的思想能量。

近年来承思身居居江一隅之地,大隐都会,坐观云起,秉承大师遗志,继续传播“国学”,卓然有成,对于发扬经典是一份珍贵,对时代也是一份福祉。